

都會遺蹤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第10辑 2013-2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回眸近代上海海港检疫

张仁奎与山东旅沪同乡会

崇明近代教育、史志专家曹炳麟

施蛰存聚拢海派作家

《上海社会》——20世纪初期寓沪外侨

生活画报

石库门建筑山墙的装饰艺术门类

上海迎财神

我给谷超豪当秘书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生活·林出版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编

都會遺蹤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第 10 辑 2013-2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会遗踪. 第10辑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11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

ISBN 978-7-5486-0583-6

I. ①都… II. ①上…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0620号

主 编 / 张 岚

都会遗踪 第10辑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编 者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责任编辑 / 吴伦仲

特约编辑 / 周 河

装帧设计 / 福山设计工作室

出 版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0.5

字 数 / 30万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86-0583-6/K·53

定 价 / 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编辑委员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张 岚

编 委 吴志伟 张 岚 张明华 顾音海

黄 勇 潘君祥

执行编委 吴志伟

编 辑 邵文菁

英语翻译 吴晨烨

特别鸣谢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家赞助

版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 2013

目 录

史事论说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程 涛 01
乡规民约——旧时朱家角镇社会风气的一种维护手段	张力华 09
1826年关天培漕粮北运护航活动的考察	潘君祥 15
回眸近代上海海港检疫	刘岸冰 28
李铭与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一封李铭亲笔书信的考证与解读	何 品 39
张仁奎与山东旅沪同乡会	张姚俊 50

文物赏析

第1358分地界碑漫述	吴 为 61
《寿佳白八言联》赏释	袁争平 64

名人旧事

崇明近代教育、史志专家曹炳麟	徐 兵 69
创造社出版部股票持股者赵邦	刘丽文 76
施蛰存聚拢海派作家	朱少伟 80

文献概述

《上海社会》——20世纪初期寓沪外侨生活画报	陈 华 85
《快乐家庭》快乐人生	徐亚芳 94

名楼名宅

中南银行大楼	吴志伟 99
石库门建筑山墙的装饰艺术门类	薛顺生 107

地名述谈

崧泽地名考略 王 辉 111

汉口路——英租界最早的土路之一 朱 伟 116

译文天地

万国商团 85 周年纪念册（九） 吴晨烨 译 124

上海迎财神 克拉伦斯·伯顿·戴 著 严敏斐 译 131

往事追忆

我给谷超豪当秘书

虞彬口述 周桂发、丁士华、张剑、段炼采访整理 137

新书架

东风西渐 欧瓷惠中——欧洲瓷器三百年艺术展 邵文菁 156

Contents

Study in History

The Rise of Shanghai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Cheng Tao</i>	01
Village Rules—A Method to Maintain the Social Morality of the Old Zhu Jia Jiao Town	<i>Zhang Lihua</i>	09
Study on Guan Tianpei's Escorting the Transportation of Tribute Grain to the North in 1826	<i>Pan Junxiang</i>	15
Review of the Seaport Quarantine in Modern Shanghai	<i>Liu Anbing</i>	28
Li Ming and the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Textual Criticism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Handwritten Letter of Li Ming	<i>He Pin</i>	39
Zhang Renkui and Shanghai Shandong Fellowship Association	<i>Fan Lin</i>	50

Appreci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About LOT1358 Boundary Stone	<i>Wu Wei</i>	61
Appreciation of <i>Eight-Character Couplet</i> <i>Offering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to Gilbert Raid</i>	<i>Qiu Zhengping</i>	64

Bygones about Celebrities

Cao Binglin—A Modern Educator and Expert of History and Annals in Chongming	<i>Xu Bing</i>	69
Shareholder of the Creation Society's Stock Zhao Bangheng	<i>Liu Liwen</i>	76
Shi Zhecun Gathering Shanghai-Style Writers Together	<i>Zhu Shaowei</i>	80

Literature Outline / Literature Explaining

<i>Social Shanghai</i> —A Pictorial of Foreigners' Life in Shanghai in the Early 1900s	<i>Chen Hua</i>	85
<i>Happy Family</i> Making Life Happy	<i>Xu Yafang</i>	94

Celebrated Buildings and Residence

China & South Sea Bank Building	<i>Wu Zhiwei</i>	99
Decorative Art of the Gables of Shikumen Buildings by	<i>Xue Shunsheng</i>	107

About Place Name

- Brief Study on the Place Name Song Ze *Wang Hui* 111
Hankou Road—One of the Earliest Dirt Roads
in the British Settlement *Zhu Wei* 116

Translation World

- Eighty 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IX) *Wu Chenye* 124
Shanghai Invites the God of Wealth *C.B.Day Yan Minfei* 131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 Acting as Secretary of Gu Chaohao
Dictated by Yu Bin
and Interviewed by Zhou Guifa, Ding Shihua, Zhang Jian and Duan Lian 137

Reading List

- Guide to Art Exhibition of the Three-hundred-year European Porcelain^{*}
Shao Wenjing 156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The Rise of Shanghai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程 涛 Cheng Tao

本文试图通过勾稽排比相关史实，以阐明上海在宋元之际的兴起，实与隋唐以降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密切相关；而南宋由于退居东南一隅，更使得东南的江浙地区兼有政治与经济中枢的地位；而地处该区域内的上海，得以挟其区位优势迅速崛起，取代邻近的青龙镇，成为市舶通商之地。入元以后，由于经济、政治中心分处南北的格局已定，遂有海运漕粮之盛举，上海因此成为漕粮运输中心，其地位愈发显著。

By sorting out the related historical sourc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ound that the rise of Shanghai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igration of the economic center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s the Southern Song retreated to the southeast region, the Jiangsu and Zhejiang became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re areas, while Shanghai an unknown place located in this area, rose up sharply with its geographic advantage, replacing the adjacent Qinglong Town and growing into a city for shipping trad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were separated respectivel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art of China, and Shanghai occupied a more prominent position as an important basement of maritime transport.

关于宋元之际上海的崛起，以往学者已有措意，然或侧重史地沿革之考证，或属概述性的通论^[1]，对其历史背景等方面之探讨，则未及深入，尚有余蕴可供发挥。故本文不揣简陋，于史料稍加勾稽，并参酌前人之研究，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自西晋永嘉之乱以降，及至两宋之际，经济重心自北向南的转移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大趋势，而其最终完成，是在南宋^[2]。南宋较之以往朝代的一大特殊之处，在于其背海立国，即将东南滨海之地作为统治的根本^[3]，具体言之，是长江下游的苏松、宁绍平原。就政治区划来说，则为隶属于两浙路的常州、湖州、平江、嘉兴、绍兴、临安六府之地。世所习称的江南，其地域范围大略与此同。这一地区历东晋南朝之开发，到

隋唐之际，又获益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已成为帝国的粮仓。自安史之乱后，更有“三吴者，国用半在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4]之类的时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衡量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指标，就是粮食的产量，故田赋所出便是经济重心所在，或者说是经济要区（key economic areas）^[5]。唐代以长安、洛阳为两京，而当日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为了将江南的米粮，输往北方以支京师之用。如此则分处南北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藉由运河而得以沟通，使帝国的统治得以维系。降至北宋，定都汴梁，立国情势与唐代大类相似^[6]，仍是以南方的物资支应北方的军政中枢。但到了南宋，退居东南一隅，据守半壁山河，情势为之一变，除了经济中心的南移，政治中心的南移，也是至为关键的一端，如此，则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便整合为一。上海在宋元之际的兴起，实与这一局势密切相关。

而背海立国，尚有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依托海洋。宋世于海外贸易尤为重视，海舶所入，为国库收入之大宗，尤其是南宋初年，“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7]。高宗绍兴七年上谕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少宽民力尔。”^[8]而与奖劝海外贸易相辅而行的，是在沿海的诸多港口，皆设有管理蕃汉间海上贸易的市舶机构。就两浙沿海一带而言，则先后有杭州、明州、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澈浦镇六处，其中华亭县、青龙镇、上海镇三处隶属嘉兴府，均在今日之上海地区^[9]。三地之中，以青龙镇兴起最早，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云：“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径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又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云：“青龙镇，去华亭县五十里，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而撰于元丰五年的《隆平寺经藏记》更谓：“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蛮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右宗姓之所会。”就地理位置而言，处于江海交界之处的青龙镇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恰是这一优势，为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伏笔，也为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从水文地理的角度看，吴淞江的通海河道并不稳定，自宋代以降，因为海潮倒灌而致泥沙淤积湮塞河道的情况屡见载籍，而入海口亦是变迁不定，青龙镇的衰落与上海的代兴，便与此休戚相关。清人褚华的《沪城备考》于此有述：“吴淞旧自芦子城下迤东北行，而复

南出于虬江、沙洪之间以入海，阔一百五十丈，是名旧江。宋时，商舶自旧江直达青龙江，后因上游壅塞，遂设上海市提举市舶司，以榷其货，由江以通榷场。”上海设提举市舶司一事，值得详论，因市舶之设，表明上海作为通商贸易港地位之确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市舶司》对于两宋市舶机构的设置沿革记载尤详，其起于北宋初年，止于南宋嘉定以前，而通篇未有提及“上海”，可知上海市舶司之设，应在之后的南宋末年，而与上海之设镇，约略同时^[10]，两者间当有所联系。按：宋制镇从属于县，多为工商业发达之所在，设监镇官，以“掌巡邏盗窃及火禁之事，兼征税、榷沽则掌其出纳会计”^[11]。又弘治《上海志》中保存有宋末董楷所撰的《受福亭记》和《古修堂记》，由此二记可知其时董楷既为舶司官，又为监镇。谭其骧先生据此认为，宋代的市舶司与镇虽为不同性质之机构，但上海一地情形特殊，设镇实为应设置市舶之需，因为“上海镇和上海市舶司都不见于淳熙以前的记载”^[12]，虽是推论，但甚有见地。要之，则上海一地，北宋时仅有设酒务之载记，至南宋后期，或有商税务之设，末年设镇并置市舶，可见南宋确为上海发展的一大关键时期。而上海在南宋时期，除了作为通商贸易港，在军事战略上，也当据有一席之地。顾炎武曾有论：“嘉定沿海地方共七十里，吴淞江口乃适中之处也。繇江口延袤而南，则自老鹳嘴以至宝山、南汇、金山出江口迤而北，则自彩淘以至黄窑、刘家河，繇江口而深入，则南迤五十里即为黄浦，直至上海。繇黄窑而登岸，则嘉定、太仓、昆山、苏常连数百里，是吴淞江者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藩篱，乃东南第一险要，备吴淞江即所以备上海，备上海即所以备苏常也。”^[13]按：亭林先生此论，虽是针对明代备倭之事而发，但亦可说明上海在东南沿海防卫中的重要性，若结合宋金对峙的形势及宋元鼎革之际的史实，将会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南宋初年，金兵铁骑南下，高宗仓皇逃难，其时作为南北交界的两淮地区（即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成为宋金交战的前沿阵地，而再往南的苏松平原实可视为江南地区的第二道藩屏，亦是最后一道防线，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高宗曾在金兵追迫下，于宁波入海逃难^[14]，对于一个君主而言，如此狼狈屈辱的经历可谓刻骨铭心，这与他日后以杭州为行在（即都城）当有很大的关系。南宋京师距海之近，为国史诸朝所罕有，海上防御之需要，也因之愈加凸显。而近代以来，已有学者指出通商与海防，对于南宋时代的江浙沿海地

区而言，是紧密相系的两端^[15]。考之史实，临近上海的青龙镇和江湾俱为南宋时著名的水军基地，则同样襟江负海的上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自当不亚于前两地，可举蒙元取宋之战略以为证。当日在攻克襄阳之后，元军顺长江而下，直逼南宋的东南腹地，而担任统帅的丞相伯颜“与阿珠议平宋大事，遂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右军以参政阿喇哈、四万户总管鄂齐等帅蒙古、汉军步骑十余万众，自建康出，由安庆直趋独松岭。左军以参政董文炳、蒙古官帅万户张宏范、万户张祗、都统范文虎、王世强、管如德、史胜等、省都事杨晦，领幕府事，水陆精兵数十万，出江入海，取道江阴，进趋许浦、澈浦、上海、华亭等处。丞相暨左丞阿达哈至中道，行都省事，统帅群将，咸受节度，裁断大事，帅蒙古汉军一万众，水陆继进，趋常州。”^[16]《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上谕云：“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则江南作为南宋的统治核心区，实与国运之兴亡相系。而观元军水路所进趋之战略要地，将上海与华亭并举，足见其地位之提升。

又上已提及，上海于宋末已有市舶之设，而灭宋后不久，便“立市舶司于庆元、上海、澈浦”^[17]。元代享国不足百年，制度未备，然海外贸易之繁盛则逾于前代，为史家所艳称。元世祖于运筹擘画灭宋统一的同时，亦注重保护海外贸易，顺应蕃汉通商之大势，如市舶之制，“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18]。又《国朝文类》卷四十“市舶”条云：“皇朝平定江南，幅员既广，贡赋益伙，于是泉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邻海诸郡与远夷蕃国往复互易舶货，因宋制，细物十分而取一，粗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博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而所入之货尝以万计，其法至详密矣。”由是观之，上海的崛起，除了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亦获益于元代对海外贸易的积极维护与发展。包括上海在内的华亭县，“繇魏晋以降多文人，磅礴秀絮……宋世文儒益光显，冠带相望。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奇货善物往往充上国，力事生产，广田侈居，拟于王侯，而仕者亦争愿食于其土”^[19]。足见其昌阜发达之况。

不过，上海在有元一代之地位，尚不止此。蒙元定都燕京，称大都，又复归于政治与经济中心南北分立的局面，南北漕运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当日大运河各段或因战乱而残破，或因泥沙淤积而阻塞，已无法胜

任大规模的漕粮运输，则海运之举，实是大势所趋，元人危素所撰之《海运志》（学海类编本）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初伯颜平江南时，尝命张瑄、朱清等，以宋库藏图籍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乐，旱站陆运至洪门，入御河以达于京。后又开济州泗河自淮至新开河，由大清河……又开胶莱河道通海，劳费不貲，卒无成效。至元十九年，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以为海运可行，于是请于朝廷，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粮，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从海道至京师，然行海洋，沿山求屿，风信失时，明年始至直沽，时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仍各置分公司，以督纲运，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乐，京畿漕运司自中乐运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积翁议，令阿人赤等，广开新河……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富国、池、饶……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盖自是博矣。初海运之道，自平江刘家港入海，经扬州路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头万里长滩开洋，沿山屿而行，抵淮安路盐城县，历西海周海密府东海县密州胶州界，放灵山洋，投东北路，多浅沙……计其水程，自上海之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来，朱清等言其路险恶，复开生道，自刘家港开深……又开新道从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当舟行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视前二道为最便云，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又《元史·食货志一·海运》载：“（至元）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万户府二，总为四府，是年遂罢东平河运粮。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运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务置司领，接运海道粮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属有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督岁运。”又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海运”条云：“国朝海运粮储，自朱清、张瑄始，以为古来未尝有此。按杜工部《出塞》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

粳稻来东吴。’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如此，则唐时已有海运矣，朱、张特举行耳。”可知海运虽非元代创制，却是其一大盛举。又宋元时期造船技术空前发展，当时修造载重达二三百吨的大型海舶已非难事^[20]，航海技术也因指南针的广泛应用而大为提高，这些都为海运漕粮的推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由上引危素之文可知，上海在元初已是南方重要的海运漕粮基地，查检刊于至元二十五年的《至元嘉禾志》卷七《仓库》，上海设有“太平仓”和“永丰仓”，当是海运粮仓无疑^[21]。其时海运港口虽在刘家港，但上海作为海运仓储所在之地，仍是不容小觑。合上之所述而观之，则上海在由宋入元以后，既有市舶司之设，又为海运漕粮重镇，当知其地位之重要。当然，这从上海一地行政级别的提升，亦可得见。元初上海仍隶属于松江府华亭县，至元二十七年，时任松江知府的仆散翰文以华亭“民物繁庶”，奏请析其东北五乡立县，其议得准，于次年正式立上海县^[22]。上海县所辖之地“虽濒海而广原腴壤，尽境皆然。极目万顷，莫有旷土。以十分计之，良田盖居其九……虽素号泽国之乡，而平畴沃野居多，况东依洋海，北枕吴淞，又天下之所闻之，言形胜者莫强焉，是足以壮兹邑矣”^[23]。新近研究指出，元代江南地区地方官府的升格十分普遍^[24]，则上海设县，不过是这一大趋势下的其中一例，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反映出元帝国对江南地区的重视。因为这一地区是帝国财源之所出，经济上的举足轻重，才是政治地位上升的根本原因。

综括以上所述，则上海一地于宋元之际的兴起，实得益于唐宋以降，经济重心的南移，易言之，是江南地区逐步成为帝国的财赋渊薮，而南宋一朝，因其特殊的立国情势，对江浙沿海地区尤加重视，地处该区域的上海因其襟江滨海的优越条件，而被赋予了军事与经济的双重地位，并在宋元鼎革之际，凸显其特出之地位。入元以后，一面延续了唐宋以来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一面又大兴海上贸易，上海兼得海运与市舶之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以往研究上海史的学者，理当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南北经济发展的消长变化对其兴起的影响，但并未特加指出，故撰此文以明之。

注 释:

- [1]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7页;王曾瑜撰《宋代的上海》,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第73~74页。
- [2] 张家驹著《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67页。
- [3] 刘子健撰《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载《两宋史研究汇编》,中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0页。
- [4] 唐杜牧著,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礼部尚书崔公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0页;唐韩愈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送陆歙州诗序》(四部丛刊本)卷十九。
- [5] 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 [6] 全汉升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版,第32~76页;第92~122页。
- [7] 清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海外诸蕃条》。
- [8] 见《宋会要》,转引自清梁廷枏:《粤海关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卷三,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页。
- [9] 周振鹤撰《两宋时期上海市舶机构辨证》,载《上海研究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9页。
- [10] 谭其骧著《长水集——上海得名和建镇的年代问题》,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 [11]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六十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2~1913页。
- [12] 同[10],第202页。
- [13] 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四,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57页。
- [14] 《宋史·高宗本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71~475页。

[15] Jung-Pang Lo, 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2, No. 1 (Jan., 1969), pp. 57-101.

[16] 元刘敏中撰《平宋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中，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2页。

[17][18] 《元史·食货二·市舶》，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01页。

[19] 元袁桷撰《清容居士集·乐善堂记》（四部丛刊本）卷十九。

[20] 陈高华撰《元代的海外贸易》，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第65页；关于宋元时期造船技术的发展，还可参看元吴自牧撰《梦粱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1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08~109页；谷霁光著《谷霁光史学论文集·宋元时代造船事业之进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3~413页；【日】桑原骥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4~79页。

[21] 见王曾瑜前引文第73页。

[22] 关于上海设县之年，历来有元至正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三说，此处采纳的是周维衍先生的说法，即至正二十八年说，详见其论文《上海设县年代辨正》，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第54~55页。

[23] 明郭经修，唐锦纂《弘治上海志》卷一。

[24] 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乡规民约——旧时朱家角镇 社会风气的一种维护手段

Village Rules—A Method to Maintain the Social Morality of the Old Zhu Jia Jiao Town

张力华 Zhang Lihua

乡规民约是地方上传统的公众舆论压力和道德规劝，是广大农村地区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旧时，多将乡规民约勒碑示众。古镇朱家角尚存数块清代石碑，以“禁网”、“放生桥永禁”、“永禁勒索”等为主要内容，提倡“和气”、“好善”，禁止一些不文明现象，在历史阶段对维护地方秩序、营造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见证历史的重要载体。

Village rules is a kind of local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moral remonstrance and conventionalized traditional custom in most rural areas. In the ancient times, many rules were carved on tablets and exposed to the public. Several stone tablets of the Qing Dynasty are still preserved in Zhu Jia Jiao Ancient Town with such contents as No Deceiving, No Accommodation on Fangsheng (Life-Free) Bridge and No Blackmailing, which promoted harmony and beneficence as well as prohibited uncivilized phenomenon. Historically, these rule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local order and creating social morality in the history, becoming a vital witness of the history.

大家常常用“民风淳厚古朴”等字眼来描绘一个地方良好的社会氛围。无论古今，淳厚古朴的民风，不单单要靠统治阶级强制性的法律措施来形成和维护，地方上传统的公众舆论压力和道德规劝也在很大的程度范围内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乡规民约，是广大农村地区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

旧时有许多乡村将本地的乡规民约加以归纳总结，并勒石示众，作为民众共同遵守的准则。古镇朱家角历史上商业繁华，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为其商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和谐的土壤。几块清代的石刻碑文所记录的一些乡规民约，可窥见历史上朱家角镇维护社会风气的一些手段。